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农民的终结

LA FIN DES PAYSANS

[法] 亨·孟德拉斯 (Henri Mendras) / 著 李培林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出版社

〔法〕H. 孟德拉斯 (Henri Mendras) / 著 李培林 / 译

农民的终结

LA FIN DES PAYSAN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的终结 / (法) 孟德拉斯 (Mendras, H.) 著; 李培林译. —2 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6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ISBN 978-7-5097-1054-8

I. ①农… II. ①孟… ②李… III. ①农村社会学—法国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4973 号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农民的终结

著 者 / [法] H. 孟德拉斯
译 者 / 李培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钟 敏
责任编辑 / 钟 敏
责任校对 / 崔冬梅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7.25 版 次 / 2010 年 6 月第 2 版
字 数 / 274 千字 印 次 / 2010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054-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0-270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 马 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 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 冯 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教授
- 爱德华·弗里德曼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教授
- 刘 东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
- 朱云汉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
-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学部委员
- 米 健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 汪 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 苏国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 陆象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顾问，研究员
- 周 宪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俞吾金 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姚介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人文学院教授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黄 进 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
黄俊杰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编审
韩冬雪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 1839 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 1842 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 300 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以 20 周年

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 and 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目 录

导 论 关于农民的研究	3
-------------------	---

第一部分 农民社会的变迁和变革

第一章 变迁的力量和机制	21
第二章 土地、劳动和时间	41
第三章 家庭和经营	65
第四章 一项变革：杂交玉米	83

第二部分 农业劳动者及其企业和社会

第五章 企业家及其决策	111
第六章 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和状况	138
第七章 国家中的农业劳动者	165
结 论 可能的未来	191
跋 二十年之后	212
参考书目	241
人名对照表	255

乡下人！一个奇特的古词。渔夫、猎人、农夫、牧人，人们现在还能真正理解这些词的含义吗？人们对这个化石般存在物的生活思考过片刻吗？他在古代史的书籍中被如此经常地谈论，人们将之称为“农民”。

G. 塔德：《未来史片断》，1896 年

导论 关于农民的研究

20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长久以来，马尔萨斯的忧虑首次变得如此现实。在所有的陆地，人口都比生存的必需品增长得更快。从全球来看，农业的生产过剩不再会是令人恐惧的了，食品的欠缺令人焦虑不安，只有工业社会的管理和生产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农学家们发出报警的呼声。“不发达国家”的巨大农业潜力起初曾使他们产生过幻想。他们曾认为，某些先进的技术就足以使那些方法落后的国家的生产增长 1 倍，有时甚至增长 10 倍。但 R. 杜孟作为先驱者之一，首先惊愕地发现，一种技术，尽管十分先进，当它没有被农业劳动者接受和使用时就都不会有任何帮助。然而，经验证明，技术在工业国家农业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在其他地方快得多。法国或美国的农业生产增长 1 倍要比印度农业生产增长 10% 更为容易，苏联在半个世纪中取得了工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但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农业国家更缺少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能力，他们反而要向工业国家乞食。

对于这些令人焦虑的问题，社会科学能够给予什么样的回答呢？有客观历史的研究，有经济学家们近来对增长问题发生的兴趣，有一些人类学家的专题论文，还有社会心理学界关于人们对变化的态度的某些研究，但没有任何综合性的研究，没有任何可以指导执政者的政策和负责人的行动的整体理论。这就很容易理解，当农学家断言“撒哈拉以南非洲起步不好”（杜孟，1962）^①

① 本书的所有注解都是根据原法文版译出的，这里注明的是参考著作的作者和出版年代，可在书后的“参考书目”中根据人名和年代查到书名；下同。——译者注

时，社会学家却只是提出质疑：“撒哈拉以南非洲能否起步？”（梅斯特，1966）这种令人痛心的对话，当会引起正直人的愤慨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羞愧。要想知道怎样使全世界的农民进入工业文明，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和走向繁荣，难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国家已经完成飞跃的农民吗？



19 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它们对乡村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它们所有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和都市社会的。由于受工人阶级的诞生、资本主义企业惊人的效率以及货币构成的唯一手段所迷惑，它们对没有工资、没有企业主、没有货币条件下运转的社会体系失去了兴趣，然而一个世纪以前，西方大多数国家属于这种社会体系，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属于这种社会体系。

只有一些研究农民的专门作者继承着古代和中世纪农学家的伟大传统。但 M. 多巴瑟、F. 诺沙都、A. 葛斯帕林和 L. 拉沃邦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往往只是在重复瓦隆、科伦麦尔、塞尔或罗兹埃教士说过的东西。他们是优秀的观察家，对于农业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过，当古典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设计“工业经济”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对乡村经济作出什么革新。勒普莱（勒普莱，1879）和他的学派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中试图像考察工人家庭那样细致地考察农民家庭，以期把握农民家庭的精髓。毫无疑问，如果他们坚持客观性的志向，不被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引入歧途，他们的研究会有新的前景（勒费布沃，1949）。

热衷于调和民法和习惯做法的法学家们，在法理上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分析家庭经营，因为家庭经营必须使家庭的需要和经济的强制要求以及农学家的愿望协调一致（M. 儒哥拉尔，1958）。不管在土地所有和土地经营的各种不同形式方面，还是在劳动成果的分配方面，乡村契约合同都是如此的丰富多样和精巧细致，表明法学家们对农村的技术与经济实践以及习俗和社会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法学理论作为一门由公证人和法官运用的，但却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少了解的规范学，是观察和认识的成果，它比很多描述

性的研究更适合于丰富的社会学构思。

此外，从玛丽-黛莱丝时期的奥地利到斯托雷宾时期的俄国，东欧土地改革的伟大运动都有它们的理论家和空论家。今天，人们读他们的著作仍有收获，特别是如果人们对不发达国家感兴趣的话。然而，人们却很少能从中获得适合于现代社会学的材料。

与此相反，俄国民粹派曾试图建立一种适合于现实的真正的乡村经济理论，半个世纪之后，这种设想仍具有令人惊奇的现代性。令人痛心的是，如此有希望的智慧之举都被一些政治领导人粗暴地破坏了，这项知识事业本可能恰好避免这些政治领导人的很多失误。特别是柴雅诺夫（柯布莱，1965），他曾从帝俄吮代地方自治会的核算出发，试图建立一种不考虑货币的农民企业制度。他从农民的观点和农场主的观点这两个方面对帝俄的国有体制进行了双重分析，提出了一些调和农业生产要求和现代经济需要的可能方式（柴雅诺夫，1924）。人们可以想象，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苏联农业将会是何种情景。

这些为观察和理解农民所做的孤立的努力都注定要遭到失败。但他们的贡献在于使得自己的时代相信，农业的活动所遵循的是芝诺芬和赫西俄德的箴言：关于主体我们已言尽于此，敏锐的精神应当转向其他领域。

与此同时，自由经济的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获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功。然而，这两者都一致否认农民经济社会体系的独特性，试图按照从都市和工业现实出发建立的范畴和观念对它们进行分析。这种在知识体系上对农民的虚无化很值得细致分析，以便向人们揭示它是如何产生的和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在19世纪，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为了使人们既能保持古老的乡村价值，又能体验进步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冒险生活，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出各种和谐社会和法伦斯泰尔^①，那儿的时间和劳动在田野和工厂之间分配，人类将会在和谐地发挥

^①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要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译者注

自己的各种才能中获得解放和全面发展。所有的人都认为，遵守社会秩序、道德和信仰的农民应当养活城市，并像供给步兵营那样供给工业营的富佬。

运动、革命和进步都在别处发生：在城市里，它们吸引着所有期望变化的人们。在19世纪，人们从这种对比中，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农业从来未发生过任何变化，农业劳动者始终遵守着田野的永恒秩序。

一个世纪以前，当制作业还处于手工阶段时，农业就发生了革命，农民动荡不安，并准备烧毁城堡，对农业和农民的这种写照大概会令人非常惊奇。农业的改进曾是那个时代的重大事务（奥吉-拉里贝，1955）。在法国，国王作出表率，贵族大人物则追随其后，在自己的领地建立“农业社会”（朱斯坦，1935），探索说服农民的最佳方法。1788年，R. 德·拉贝吉利发表了《对阻碍农业进步的主要流弊的研究》，其论题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A. 荣格面对某些地区的原始农业发出的愤怒“诅咒”和他访问一些美好领地的“欢悦”也表明了当时的进步所具有的规模（荣格，1931）。

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都像英国人那样，想圈地养羊。但是，由于没有公共牧场而无法饲养牲畜的散工以及小农反对这种个人主义的财产专有形式，他们“为土地私有化而进行的斗争”使整个王国动荡不安，打破了乡村社会的平衡（布洛克，1930）。

大多数法国农业史学家都庆幸“法国的明智”，由于这种明智，我们的国家避免了18世纪的农业革命所带来的极端社会后果，从而能够保留下众多的农民，而英国人，由于他们向工业经济的逻辑让步，为工业的发展“牺牲”了农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国是在行进路上停顿下来，它停歇了一个半世纪，在缓慢接受技术新潮的同时，它的农民仍然是“农民”。

今天，第二次农业革命震撼了一切结构，明智的平衡被打破了。轮到农业自身“工业化”了，延迟了150年之后，法国农民被人们所说的工业文明所扼杀。我们突然感到十分接近18世纪，我们重新发现，自然会被技术所驯服，土地的历史是由不断的进步、革新和改进所组成的，农业劳动者都是不安分的。然而，从本质上说，我们仍然停留在19世纪遗留给我们的观念之中，而这些观念显然都已过时了。

对于驱使全世界农业社会投入更新技术和重建社会平衡的伟大运动，如果我们不想依然是那样麻木不仁和视而不见，最重要的就是要修正我们的观

念，以新的眼光看待农村。农民在工业化最快的国家中的消失，与其说是由于经济力量的作用，毋宁说是由于把并非为农业而制定的分析方法、立法措施和行政决策运用于农业。

在一些国家，如英国和美国（贝内迪柯特，1955），农业完全服从于工业社会的逻辑，但农业仍是无法消除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过多牵扯了华盛顿和伦敦领导人的精力。

在法国，一个恰当的著名例子就是完全按照工人联合会的意图制定的1884年工会法案，这个法案之所以被扩展到农业，是因为一个参议员在会议结束时想起建议在法案的陈述中加上“以及农业”一句。由于这最后时刻添加的一句话，整个农业联合会运动才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并担负起立法者未曾预料到的重要经济职能。今天，人们仍可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向农业领域的扩展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具有某种意义并对所有受薪者都似乎公平合理的立法，对农业经营者却像是一种施舍，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最后，如果说法国自一个世纪以来没有真正的“农业政策”，这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构思这种政策的知识工具。

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政治家与他们的“资本主义”同事感到同样的无能为力（依格比，1963）：尽管他们建立了集体农庄、公社、合作社和农业城，他们总是与他们的农民存在争执，农业是他们经济的薄弱点。令人奇怪的是，生产土豆和肉食品似乎比制造火箭和卫星更为困难。马克思曾显露出对农民缺乏了解，但从这一点来寻找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否会走向极端呢？

不论是波兰和南斯拉夫，还是印度和古巴，都还没有为人们所说的不发达国家找到出路（奥吉-拉里贝，1950）。中国的经验是迷人的，但它的成功并没有把握。以色列的杰出成就由于其独特性而无法模仿。难道仅仅是由于工业社会的逻辑与传统农民社会的逻辑不相容？期望把前者应用于后者显然只能导致对后者的破坏。

今天，工业社会的观念已被普遍接受了（阿隆，1962）。那么“农民社会”还意味着什么呢？农民社会（R. 莱德弗尔德，1956；托尔耐，1964）是在一个更大范围的总体社会中相对自治的整体。如果一个土地社会完全是自治的，在功能上并不是一个更大范围社会的组成部分，那我们是在谈论“蒙昧”社会，我们是在18世纪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它似乎

比目前的那些术语更为适当（原始的、古代的、没有文字的、没有历史的，等等）。而如果乡村集体相对于包罗一切的社会来说不享有相对的自治，那我们是在谈论农业生产者、地方群体，也可能是乡村“阶级”，但不是农民整体。一言以蔽之，农民是相对于城市来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就无所谓农民，如果整个社会全部城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了。

农民社会可细分成地方社区（R. 莱德弗尔德，1956），这种社区在人口、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相对来说自成一体。根据马克思的著名描绘（马克思，1963），19世纪的法国农民像“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每个社区都是一个社会整体，所有社区都属于同一类别，但每个社区又都有自己的独特性（阿兰斯堡，1961）。

每个社区都是一个互识的群体（马热，1955），其中每个人都认识所有的人和他人的所有特点，社会关系是人格化的、非功能性的和分割成部分的。社区将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农业耕作者、牲畜饲养者、土地所有者、经营者或受薪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和非农民（显要人士、手工业者和商人，等等）结合在一起，但社会主调是由农民决定的。权力一般属于那些处于地方社区和总体社会之间的边缘地位的显要人士。最重要的分层常常是在依照社会经济的威望来确定的等级方面。除此之外，分层也可以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生态方面或广义上的家庭方面，亲族和主顾经常是混同的。最后，年龄和性别的范畴一般都是非常个性化的。

在这些结构非常牢固的社区中，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整体的稳定，变化只能曲折迂回地通过否定自身缓慢导入。这些社区并没有僵化凝固，但除非有严重的危机，否则他们只能按照世代交替的节奏缓慢进化。所有的革新，不论是技术的、经济的，还是人口的，都来自外部。A. 多扎几乎毫不怀疑在这方面存有的偏见，他断言“乡村什么也不创造，它的一切均来自城市，服装、习俗、歌曲……人们还可加上机器和技术”（奥吉-拉里贝，1955，导论和第147页；多扎，1941，第130页）。

在这样一个社会体系中，个人不需要去适应新的境况或做出什么决定，也不需要向其他了解自己全部特性的人去表白和公开什么。于是，他会一成不变，保持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价值和规范的准则都不鼓励个人感情和观点的显示与表露。

自中世纪中叶直到 19 世纪末，这种典型的传统农民社会在西欧以不同形式呈现。今天，它仍然还是一种解释模式，有助于理解乡村社区在彻底的改造中的运行逻辑。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只剩下些遗迹，由于风蚀磨损过重，以致在一些根本相异的结构中无法再理解这些遗迹的意义。

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个模式可以作为比较的基础，它的某些成分可以作为有用的解释工具，但是，如果把它视为一种普遍的模式，认为它可以用来分析更广泛的社会中的所有农业社区，那将是很危险的。为了建立类似的模式，必须对不同的社会进行多方面的研究，然后人们才能够弄清楚是否存在着一一般农民共有的唯一理想典型，以及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属类中，变化多样的欧洲农民是否仅仅是诸多种类中的一种。

二

蒸汽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它的逻辑强加给工业的，并继而将这一逻辑强加于整个社会（贝尔，1956）。蒸汽机是固定的能源，所以所有的机器都必须集结在同一个厂房里，共同使用，从而使劳动服从于固定的时刻表和等级权威。但土地是不可移动的承载物，相对劳动资料（谷物、耕地……）来说机器是活动的，因此这里不像在工厂里，那儿情况完全相反。生物的自然机制有自己的节奏，尽管有时可以加速，但不会有根本的变动。空间和时间是田野劳动的两个重要约束条件，蒸汽机在这儿不会一路凯旋。几经试验之后，蒸汽拖拉机被抛弃了（福舍，1954，第 82~88 页），由于这一失败，与一切等级权威不相干的农业经营者仍然是自己的企业、劳动和时间的主人。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与工业生产的社会组织在各个方面都形成鲜明的对比。

今天，农业较迟地经历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它已经逃避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等待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会改变很多自然机制的原子革命。借助于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内燃机使机器作用于固定的劳动资料上，从而战胜了空间的约束。化学和植物学的进步使生物节奏得以加速，并调节和提高果实产量，时间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克服了。

18 世纪的农业革命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将进步普及法国乡村。这一革命是按照工业还未能改变的传统社会节奏进行的。它带来了一些社会变